

# 高尔基研究的新开拓

——《高尔基晚年及其他》述评

张锦贻

每一个时代都会产生属于它自己的作家，但是只有真正能够站到时代前列的作家才属于人民。被列宁称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的高尔基，便是既标志着一个伟大的时代，又代表着时代精神的一个伟大的作家。在我国，他的富于战斗性的抒情散文《海燕》，他的开创性的无产阶级文学名著《母亲》，他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曾经被几代人广泛阅读，不同年龄的读者从这些作品中都能感受到他所处的时代的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高尔基正是我们了解和理解20世纪初那个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非凡意义的时代风貌的向导。然而，近年来，在国内外报刊上出现了不少“揭露”高尔基晚年节的文章；在世界文坛上，攻讦高尔基成了一种时髦！那么，真实的高尔基安在？陈寿朋同志的《高尔基晚年及其他》一书（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12.）对此作了明确而具体的回答。著者依据他在苏联留学访问时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翔实地、历史地阐述了高尔基晚年的生活和创作情况、他与斯大林的关系以及他的死因等一系列在苏联和世界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问题。

但是，决不要因此以为这本13万字的写高尔基晚年的书是资料书或是散文集，它其实是一本严谨的学术研究著作。著者在充分掌握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以胸有全局的历史透视力和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来审视在历史演变中高尔基的生活和言行，再给以客观的历史分析、处理和著录，不溢美，不掩

丑，其目的，不仅使读者明了这位伟大作家的晚年状况，而且通过他的行状来认识历史，评价伟人，从实际生活中体味一个伟人生命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同时，在著者艺术地描述出高尔基晚年的生活史、创作史的过程中，显示出这位无产阶级文学创始人的人格的形成和发展，突出他在思想和艺术上所达到的独自境界。书中重在反映高尔基的人格素质在晚年生活中的体现以及这时的文格特色。因此，这本书在提供了切要的资料的同时，呈现出自己独特的学术价值。它与著者在80年代前期写成、出版的《高尔基美学思想论稿》、《高尔基创作论稿》，共同构成了高尔基研究的理论体系。这是在我国的高尔基研究领域中所取得的新的成果。

## 二

《高尔基晚年及其他》这本书中，着重地叙述了集作家、学者、战士这三重人格于一身的高尔基在晚年所走过的坎坷而又富有启示的生活道路，曲折而又光彩耀目的思想历程；着重地评价了他晚年时致力于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的创作、致力于写作论文、创办杂志、培养青年作家等方面的成就和意义；并以伟大作家的爱国主义思想作为全书的灵魂，统一各个篇章，较圆满地做到史论结合；也展示出著者史识与学识并长的特点，从而形成这本书的明显的特色。

史识与学识是建立在扎实、广博的资料基础上的。本书著者占有较详尽的资料，但不被其挡住视线或沉浸其间，而是有自己的观察、分析的角度，综观各方，而后把握住高尔基的心灵世界与苏联当时的社会现实之

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与高尔基作为一个伟人的特殊个性，获得独创性的结论。正如这本书的《后记》所述：“……高尔基是个恢宏富丽的世界，他始终同苏联人民与世界革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便决定了高尔基学的复杂性和多维性。……”正是这种对人的主观与生活的客观作辩证地考察的研究方法，使著者自如地驾驭资料，在高尔基研究领域里驰骋和开拓。

基于此，著者始终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与具体的历史联系中，以发展的、整体的目光审视高尔基晚年的思想进程。这也是全书的写作总则。关于高尔基与斯大林的关系，他对待人民的态度，诸说并存，争论激烈，著者不回避矛盾，也不屈从偏见，他依据上述的原则，首先深入地分析了60多年前（1929年）高尔基写给斯大林的一封信（长期以来，我们从各种版本的《马恩列斯论文艺》中只能读到1930. 1. 17. 斯大林给高尔基的回信。高尔基的信，直到1989年才在《苏共中央通报》上发表）。高尔基在信中首先说到苏联报刊反映的新生活的阴暗面太多，这样的材料往往会成为敌人攻击苏维埃政权的子弹。然后他坦率地指出，党在青年中的威信逐渐下降，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党内摩擦”所造成。著者指出：“高尔基1928年离开意大利，他是带着对社会主义祖国无比兴奋和喜悦之情归来的。”“作为来自俄罗斯社会最‘底层’的流浪儿，作为亲眼目睹了西方法西斯分子扼杀民主力量情况的革命者，他既不愿看到斯大林用逐渐抬头的偏执与独断给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抹黑；也更不愿看到国内外真正的敌人借以从根本上把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推翻。”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高尔基，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和失误之中，内心充满矛盾、苦闷，出于对布尔什维克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无限忠诚和深切的爱，他想毫无顾忌地对党的领导人提出忠告，一如当年对列宁力陈己见那样。正是出于这个动机，他才给斯大林写了上述内容的信。作为一个人民的作家，他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做了自己应该做和在当时

条件下能够做的事情。正是这样，就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高尔基是把斯大林作为党的领袖人物来对待的，他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向斯大林反映情况，提出批评。他对俄罗斯祖国已经出现的灾难，没有漠然处之。“当然他没有像布哈林那样，对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但他也没有像拉狄克那样俯身屈就，不分是非地一味讨好；更没有像亚戈达和后来的叶若夫、贝利亚那样，成为肃反扩大化的帮凶。高尔基就是高尔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著者从高尔基所处的环境，他给斯大林写信的指导思想，他与同时代中的一些要人的区别及其具体实践活动等方面，作了精辟的论述，得出有见地的结论，是足以令人信服的。

长期以来，除了别有用心者，遍布于世界各国的好心的读者们都对高尔基在斯大林时代“保持沉默”不能理解，种种议论在无形中造成了一层帷幕，遮盖了伟大作家的思想光彩。现在，著者在本书中把它撩开了。但是，把帷幕撩开还不能使作家思想的光彩四射，重要的是，动手把这层帷幕揭掉。这就需要做一番去伪存真的工作。

著者又以诸多事实来论述，证明高尔基是“呼啸于俄罗斯大地与天空间的勇敢的海燕”。他没有停止过他的“嘹亮的叫喊”。1929年，高尔基抵制了对苏联小说创作奠基人之一的皮里尼亚克等人的“残酷斗争”。当皮里尼亚克的小说受到严厉批判，并被匆匆解除了莫斯科作家协会主席的职务时，高尔基在《消息报》发表了题为《论精力的浪费》的文章，指出对人应采取慎重态度，因为人是新生活的创造者。“……如果我们采取这样对人的态度，我们就完全会从自己的孩子们当中制造出敌人的。”高尔基谆谆告诫，切勿人为地“制造”敌人。在接着写出的《老生常谈》中，进一步揭露了“工人阶级中的贪得无厌者、恶意煽动者、小喽啰、被虚荣心折磨的家伙”。1932年，高尔基拒不写作《斯大林传》，连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让他为《真理报》写篇《列宁与斯大林》

的短文的要求也遭到拒绝。两年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被诬陷逮捕时，亚戈达再次转达斯大林要求，要高尔基撰文控诉“个人恐怖”，高尔基更响亮地回答：“我是要谴责个人恐怖，但我更要谴责国家恐怖！”1934年，斯大林借换发党证而使清党扩大化时，高尔基又写亲笔信把受父亲历史问题株连的高尔基市“红十月”糖果厂共产党员彼克罗夫斯基从厄运下解救出来；他又帮助遭受打击的俄罗斯作家札米亚京获得出国的机会；等等。这样，著者在论述高尔基晚年的精神风貌与品德人格时注意到了作家思想发展的“量”的积累，使作家思想的“质”立足于真实可信、具有内在逻辑演变的基础上。与此同时，著者又专门用一个小节写了这位伟大人物的另一面——“难以摆脱的历史局限。”在整个晚年，他也未能真正认清斯大林的错误。由于他的名气太大，面对人民群众的欢呼和人们为他的到来而装点的生活，他也写了一些并不符合实际的文章。尤其是那篇极其著名又极有争论的文章《敌人不投降——那就要消灭他》，却正是发表于农业集体化速度过快、成千上万农民死于饥荒、许许多多的人因无法生存而反抗、而被当作“工人阶级的仇敌”的时候。著者写道：“高尔基心态流向中的阴影，认识水平上的局限，既是伟大理想曲折历程打在杰出人物身上的烙印，也是杰出人物在献身理想过程中的意识不到的认识误区。伟大理想并不会因为在前进中有了迂回就失去其伟大光辉；杰出人物也不会因为在认识上有了误区而不再成为杰出。”这是以确凿的史实引发出的新颖的、有说服力的结论。它不仅为客观地、公允地评论这位伟大的革命文豪的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提供了新的分析途径，对于那些竭力要贬低高尔基晚年品格、企图抹煞高尔基晚年成就的倾向，也是个有力的反驳。

如今，斯大林逝世已经整整40年了，原苏联已经解体，高尔基的作品却仍然在本国、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中流传着，正如著者所述：“高尔基魂系人民，人民永远怀念高尔基。”

值得一提的是，著者在追述高尔基晚年思想发展的过程时，并不是事例的平铺，概念的套用，而是紧紧结合他的鲜明的个性特点，即一种炽热纯真，棱角分明、有强烈正义感的无产阶级作家的气质，给予文学性的形象描绘。著者以第一人称的亲切口吻，对一些像似琐碎的生平细节，如高尔基在儿子过36岁生日那天，穿着一件花花绿绿的东方式长衫，戴一顶绣花小圆帽，像童话里的神仙；他在被守卫阻拦会客时脸色像老虎一样，张大了嘴，低声吼着；他不喜欢苏联政府拨给他的那栋住宅楼的奇形怪状的外表和别出心裁的内部装饰；等等。都从不同侧面道出作家独特的个性与气质。以叙述丰富了议论，以抒情渗透了议论，并用这种洋溢着情思的议论实现了人物性格，突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无产阶级思想家、文学家的形象，增添了这本论著的文学色彩。

著者长期从事外国文学、苏联文学的教学、科研工作，具有较高的思辨能力与理论素养，因此在论及高尔基晚年致力于写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第四卷时，把这部小说概括为“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并将它的思想内容、人物塑造都升华到理性的高度。而在谈及高尔基的政治和其它论文时，又多能着眼于发表论文的时代背景而加以阐释、归纳、总结，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并给予公允的评断，因而使这本书又具有很强的科学性。

高尔基有一句至理名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它启示和引导人们热爱书籍，热爱知识；也启示和引导人们理解高尔基的伟大一生，理解高尔基的高尚晚节。因此，著者在《访高尔基故居》的总题下，着力地叙述了高尔基的爱书、藏书、读书、评书、写书、编书、出书。哲学方面的著作在高尔基藏书中占重要位置，设有专门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专柜。高尔基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正是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之后，是在深入地阅读了列宁的著作之后。收藏得最多的当然是文艺方面的书籍。著者细心地记叙了这方面的生动事实：绝大部分

苏联作家的著作是作者亲笔签名或题辞后赠送给高尔基的；包括有各民族口头创作和俄罗斯民间诗歌的大量珍贵的民间文学作品，是高尔基在青年时代就搜集到的；有几千本书上都留下了高尔基用颜色铅笔做的记号、写的批语等。由此论述了高尔基对一代苏联作家的支持和帮助；他本人怎样从小就受到民间文学的滋养；以及他勤奋读书而又不做书的奴隶的一贯主张。从而由一个独特的角度揭示了高尔基之所以能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作家的诸多重要的原因与过程；揭示了高尔基晚年虽处于“个人迷信”思潮泛滥的时期却仍然保持了革命家气节的思想基础。高尔基广泛而积极地阅读的习惯，一直坚持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的崇高的革命气节，使他不仅以自己的文学创作丰富了世界文化宝库，而且以卓越的理论建树，为人类的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高尔基的一生，高尔基的晚节，都说明了：只有在继承过去文化的基础上，人类才能有所创造，有所前进；高尔基一生的努力和晚节的高尚，不正是使他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根本吗？一种伟大思想的形成，一个伟大人物的诞生，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本书所论述的问题，是过去的研究者较少涉及到的。现在，著者以其缜密的、客观的论述，纠正了以往一些文章单纯地从高尔基的几部被公认为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杰作来分析和阐述他的伟大的某些偏颇，使高尔基研究得到深化，也使人们对于高尔基的那句至理名言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本书末篇《高尔基在我心中》，似乎只是叙述了著者本人的研究工作，从容写去，娓娓道来，而其实是对我国和原苏联的高尔基研究工作的发展状况、出版这方面论著的时代背景作概括性和综合性的论评。这种基于生动事实的、令读者忽而叹息、忽而沉思的、别具一格的论评，实际上包含着更充分地肯定高尔基光辉一生的深刻意义，包含着对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实践的深入总结，也包含着切身体会，包含着对某些理论问题的探讨。著者的见解不一定能为今天生活在高尔基的祖国的年轻一代所认识和理解，但是，

著者对历史和现实的实事求是的分析的态度，对于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人们，都是一种启迪。

本书附录中所提供的《高尔基给斯大林的信》（1929. 11. 27），发表于1929. 9. 15《消息报》的高尔基的论文《论精力的浪费》，以及罗曼·罗兰与斯洛尼姆斯基回忆高尔基的文字片断，都是些珍贵的史料。这些珍贵的史料，不仅把高尔基研究工作引向深入，同时，它对于原苏联社会状况的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它证实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证明了“左”的路线对社会主义的严重危害，也证明了高尔基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之所以伟大，以及在伟大之中所隐蔽的不足。而这种将史实与立论相交错、相交汇的论述方式，也正适合绝大多数中国读者对高尔基晚年生活不够了解的实际。

附录中提供的那份对话记录稿中，具体而又切要地提出了一系列启人深思的问题，并有许多有创见、有新意的回答。譬如认为弄清革命与文化的关系对高尔基研究有重要意义。因为高尔基是社会主义文化中的一个重大的、富有生命力的现象。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奠基人；与他同时代的、并得到过他的帮助的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扎米亚京、皮利尼亚克的创作也都与社会主义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循着历史发展的轨迹，对高尔基与苏联文学的发展、高尔基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问题，作了动态的、细密的探讨，使这方面的研究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并由此对我国文艺界关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作出细致的辨析和论证。而最终仍归结到高尔基晚年的思想和创作，使本书的题旨贯串始终。书中灵活多变的论述角度，既有利于揭示高尔基思想的个性特征，发人所未发，褒贬得失，切中肯綮；又使论著结构紧凑，重点突出，观点鲜明，在实际上将高尔基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可以说，这是一本富有开拓性的高尔基研究的专著，是我国高尔基研究工作的一个新的尝试。